

一、扮演「皇后」

宋嘉樹在宋慶齡誕生以後，由於他在實業方面經營得法而逐漸富裕起來。於是，宋嘉樹特意在上海虹口郊區（當時虹口區只有靠近蘇州河的一小部分是市區）農村購買土地，建造了一幢樓房。這幢樓房坐落在後來發展起來的有恆路（今東餘杭路）上。它的建築形式和房中的家具擺設，全由宋嘉樹親自設計，半土半洋，中西合璧。主樓後面是一些較小的房舍，作為僕人的住處、貯藏室和廚房；再後面是一個大菜園。宋嘉樹閒暇時，喜歡在菜園裡勞動，栽種蔬菜和果樹。

他之所以離開喧囂的鬧市把宅第建造在農村，是因為經常回憶起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幽靜的鄉村中漫遊的樂趣，一方面寄託他對第二故鄉美國的思念；另一方面也想使自己的孩子們有一個草木蔥蘢、流水潺潺的環境，陶冶他們的志趣和情操。在倪珪貞看來，這也是擺脫城市中酗酒、賭博和跳舞之類罪惡引誘的一個途徑。他們在自己宅第周圍築了一道圍牆，但比較低矮，孩子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爬過去，在別人的田地裡玩耍嬉戲。為此，宋嘉樹就得付給村民們一點賠償費用，以平息他們的抱怨。

宋慶齡在這個優美而簡樸的環境中，愉快地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尤其在假期裡，三姐妹與小兄弟聚會在一起，是他們最快樂的日子。他們在院子裡玩耍，在田野裡奔跑，採集花草，捕捉蟲鳥，毫無拘束地嬉戲。有一次，他們玩「拉黃包車」的遊戲。藹齡裝做黃包車夫，慶齡扮乘客。「車夫」拉車用力過猛，以致失去控制，慶齡被拋了出去，使她身上永遠留下了一小塊傷疤。傍晚，慶齡常常看媽媽熟練而凝神地彈奏鋼琴，靜聽爸爸那純美洪亮的嗓音隨著琴聲哼起音調奇異的美國南方民歌，有時則是藹齡和爸爸的二重唱。優雅和諧的家庭生活，使慶齡從小就喜愛文藝，對鋼琴尤感興趣，媽媽也經常手把手地教她彈奏，所以她後來能彈得一手好鋼琴。以後，宋慶齡在上海淮海中路住宅的辦公室和北京後海住宅的辦公室兼臥室，都並不寬敞，卻各擺有一架古樸的鋼琴，供她暇時彈奏。宋慶齡一生簡樸，鋼琴可算是她房中最貴重的擺設了。在夜晚，宋慶齡常常喜歡彈奏貝多芬的樂曲。這既是緊張工作之餘的一種休息，又是她高尚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更加可貴的是，宋嘉樹夫婦對子女的教育，完全擯棄「三從四德」之類封建傳統，而採用民主的方式。他們對男孩女孩一視同仁，給予同樣的關懷和正規的新式的教育，並培養他們同樣的社會責任心。他們經常教導女兒們說：「身為女人不應妨礙自己成為祖國有成就、有作為的公民。」³²

正是這樣，宗教、田園、鋼琴、英語和民主精神，使這個家庭與當時中國千萬個普通家庭相比較，處在一種「世外桃源」的優越環境中。既有基督教嚴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諧、歡樂和詩情畫意的氣氛，使宋慶齡從小就受到高尚情操的薰陶，培養出她獨特的品性：文雅善良、熱愛生活、追求真理、厭棄邪惡。

在宋家三姐妹三兄弟中，宋慶齡是宋嘉樹和倪珪貞夫婦著意培養而得到最理想效果的孩子。因為在他們精心創造的這種優越環境中培養出來的子女中，並非個個都有宋慶齡這樣的品性，雖然其他子女也多才多藝，各有優點，但各方面都無法與宋慶齡相比。

小時候的宋慶齡，與宋藹齡、宋美齡一樣聰慧，但性格迥異，不像她們那樣大膽潑辣，鋒芒畢露，而是穩重、靦腆、秀外慧中。七歲時，她依依不捨地離家到中西女塾上學。

中西女塾，英文名稱叫「馬克諦耶女子學校」(Mercy School for Girls)，是外國教會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收費的女子學校，主要發起人是林樂知。他根據自己在虹口創辦「中西書院」的經驗，看到當時中國「高貴」的婦女界在學校教育方面還是個空白點，就建議美國衛理公會，由南方女佈道會籌備在上海建立一所專門吸收「高貴」華人女兒的高級女子中學。這個建議使教會的領袖們得到啟發，感到過去他們在中國的工作確實太不上算了。他們想：「為什麼我們教會在中國不斷地為乞丐們開辦義務學校？假使讓富有的、聰明的中國人先得到了上帝的道理，再由他們去廣泛地宣傳這個『福音』，我們不是可以少花人力和物力，而

在中國人中間發揮的力量和影響卻是無窮無盡的嗎？」³³美國教會研究了林樂知的建議後，認為這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意見，因而大力支持。這是從

教會方面考慮，想通過辦學培養為他們工作的中國女界領袖。

從中國方面看，當時也有了客觀條件，如該校第一任校長海淑德 (Laura Haygood)³⁴女士在籌備學校時給女佈道會的信中所說，中國富有的家長們不願意送自己的子女進教會開辦的慈善性質的義務學校，因為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是窮人家的女兒。富有的家長們不願自己的



學生時代的宋慶齡。她七歲進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所用的英文名字為 Rosamond。宋慶齡從小學習勤奮，性格嫺靜而好思考，特別喜愛學習英語和文藝，她參加中西女塾的話劇排演，很得老師和親友的讚賞。

33 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載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一九七八年第一輯。薛曾任中西女中校長。

34 海淑德，美國喬治亞州人，十八歲時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女子大學。她擅長英國文學，旁通法、德和希臘文。任教二十年，成績出色，被提升為亞特蘭大市女子中學校長。工作之餘，在教會擔任義務工作。一八七八年林樂知回國休假時，就在她服務的禮拜堂介紹中國情況。會後，林樂知曾邀她到中國一同工作，一直聯繫了六年，到一八八四年，海淑德答應要求，服從教會派遣到了上海。

女兒和她們生活在一起。有許多富有的家長，願意自出學費給子女上學，因此很希望現在就有一所合適的學校。從各方面的徵象來看，這類學校的學生一定會不斷增加。每個在國外留學過的中國男子，都希望他的姐妹、妻子和女兒受到新式教育。現在中國還沒有一所他們認為理想的、外國人辦的正規的學校。因此，只有延請家庭教師或者由兄長和父親在家裡充當教師。

經過幾年籌備，一八九二年三月，中西女塾終於在上海漢口路建成，並屬於著名的慕爾教堂的一部分。

馬克諦耶就是那個歧視宋嘉樹並給他委派第一個傳教聖職的主教的名字。中西女塾之所以以此命名，是因為他曾大力支持該校的創辦，但在學校正積極建築校舍時去世，學校為了紀念他的「功績」，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該校的中文名稱——「中西女塾」的涵義，則是林樂知為了使其步「中西書院」之後塵，同時也是根據美國教會辦學的宗旨和教育內容，培養亦中亦西的「通才」。

這個學校的課程設置有語文、英文、歷史、地理、宗教、刺繡及烹飪等。除語文課外，一律都用英語教學，連中國的歷史、地理課本也是美國人編寫、在美國出版的，而且由美國教師講授。

由於該校的英語教學一直堅持高標準，在家庭中又有父親的輔導幫助，使宋氏三姐妹受益匪淺，為她們以後都能夠操一口令人羨慕的流利的英語打下堅實的基礎。三姐妹的英文口

語，還各有特點：宋美齡悅耳動聽，宋藹齡低沉流暢，宋慶齡文雅甜潤。

宋嘉樹夫婦之所以把自己的三個女兒先後送進這個學校，顯然如上述海淑德所指出的，由於宋嘉樹早年在美國留學的經歷，希望自己的女兒在這裡受到完全西式的正規教育，並受到系統的宗教生活的薰染。還有一個原因，由於交通落後，當時的漢口路（舊稱三馬路），到虹口宋家住宅有很長一段路。寄宿於學校，可以使她們像父親那樣，從小就培養獨立生活、個人奮鬥的精神。此外，由於該校是慕爾教堂的一部分，而宋嘉樹是慕爾教堂主日學校的校長。每逢星期日，他都同妻子一起來參加教堂的禮拜，這樣也便於對女兒們的照顧。³⁵

宋慶齡從小愛好學習，讀書非常用功，常在天色已經很晚的時候還在讀書，父親勸她休息。她回答說：「把功課準備好，我才快活。」她還勤於動腦，獨立思考，對一時不理解的問題或不能苟同的傳統觀念，大膽懷疑，進行探索。學校裡每星期三晚上都從外面邀請一些有名望的客人來主持宗教討論會。有時宋嘉樹夫婦也來主持會議。討論會鼓勵孩子們提問題，經過公開討論，解決她們信仰上的疑難問題。宋慶齡常常踴躍地提問。對此，妹妹宋美齡很不理解。有一次星期三晚上討論會結束後，她生氣地責問宋慶齡：「你為什麼向李牧師提問

35 關於宋慶齡在國內所讀學校，另有「三一堂女塾」的說法。但據一九三五年出版的《中華監理公會年議會五十周年紀念刊》（英文）記載，三一堂女塾在一九〇四年就已結束。另外，據薛正調查，一九〇八年畢業於中西女塾的旅美上海中西女中校友會會員韋增佩說：「宋慶齡是她中西女中時期的同學。」（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薛正致唐寶林的信）據此，宋慶齡就讀三一堂女塾的說法不確。

題？難道你不忠實於信仰？」³⁶當時，宋慶齡愛留短髮，不像別的姑娘那樣講究穿戴。她特別喜愛英語和文藝。她生性文靜靦腆，但在文藝演出時卻很大膽，演技頗好。她曾參加該校低年級的一次期終演出，在劇中扮演一位公主，後來被加冕為皇后。宋慶齡的演技，博得在場教師和家長們的讚揚。演出結束後，宋嘉樹的一位朋友登上臺高興地叫喊說：「啊哈，這樣一來，宋先生就是皇后的父親，國王的岳父！」³⁷當年的這個笑話，想不到後來因宋慶齡嫁給大總統孫中山，成為一個有趣的巧合。

這些，表現了宋慶齡智慧早開的一面。另一方面，她受環境影響和父親及孫中山的教育，又有政治上早熟的一面。

二、「我也要同你一樣」

中西女塾所在的漢口路是一條小馬路，但位於上海市正中心，東起外灘，西迄跑馬廳（今人民廣場）。外灘的黃浦江港口裡，終日停泊著掛有各國國旗的輪船。刺耳的汽笛聲此起彼起，好像在向中國人民示威。碼頭上中國苦力扛運貨物時發出的「呵唷」聲也晝夜不斷。跑馬廳是舊上海最大的賭博場所，離中西女塾只隔一條南北走向的西藏路。每當賽馬時，大批西洋冒險家和少數中國闊老闊少們都要來這裡碰碰運氣。他們歇斯底里地為自己押上賭注的馬高

36 (美)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第四十四、四十六頁。

37 同上書，第四十六頁。

呼「加油」、「加油」——這種聲音混雜在一起，組成一支舊上海的交響曲，它告訴人們：這塊土地是冒險家的樂園，勞動者的地獄。

中西女塾終日被籠罩在這樣的噪音中。宋慶齡每當路過外灘聽著這種聲音，看著衣衫襤褸的碼頭工人肩背上壓著沉重的箱包，偻偻著身子，在叮著大雪茄的外國監工的皮鞭下步履艱難地移動時，深深地感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不公平！這時，她朦朧地意識到父親平時的教誨和他與孫中山先生交往的意義。她覺得自己也應該像他們那樣，為祖國的獨立富強和民眾的康樂幸福做些什麼。

啟迪宋慶齡愛國思想的第一個老師是她的父親宋嘉樹。他經常給宋慶齡等講故事，而且講得引人入勝，富於戲劇性和幽默感。在講述的故事中，不少是他早年在美國的經歷，美國人民的熱情友好，旅美華僑的苦難血淚，在異國對故鄉親人的熱切思念，教會上層人物的歧視傲慢等。在講述時，他把基督教的博愛平等觀念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自然地融化其中：只有使國家擺脫貧窮落後的命運，才能使中國平等地自立於世界之林。這些教誨像細雨潤土一樣，滴滴滲入宋慶齡的心田。

所以說，少年時代的宋慶齡有樸素的關注祖國命運的愛國之情，主要來自父親宋嘉樹的教導，間接受了孫中山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著作中說的那樣，是直接受孫中山影響的結果。自然，宋嘉樹是直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影響的，他積極地投入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把孫中山看成是「正義之火」的象徵，失去他，這個受過美國傳教士訓練的人必然會發現，中國

的生活是如此的空虛和冷淡無情」。³⁸

一八九四年，尚未成長為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的孫中山，由於受到當時盛極一時的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對清朝政府抱著若干幻想，寄希望於統治階級上層某些人物。而當時在清政府裡掌握軍、政、外交大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對朝政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李鴻章熱心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所以一般人把他視為識時務者。孫中山認為李鴻章如能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以挽救中國。於是，他想作一次上書救國的嘗試。在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四大主張，以西方國家為楷模，改革教育制度和培養人才，採用先進科學技術以發展農工商業，達到國家獨立富強的目的。

這年秋，孫中山滿懷希望，帶著《上李鴻章書》，偕陸皓東北上。當時，中日甲午戰爭已經爆發，李鴻章拒不接見孫中山，對他的上書只說了聲「打完仗以後再見吧！」，³⁹使孫中山的滿腔熱情化為煙雲。上書失敗後，孫中山回到上海，曾與宋嘉樹晤談上書受挫、清廷腐敗，以及其思想上受到極大刺激等情況。通過這個挫折，孫中山逐漸懂得上書請願等和平改良方法無濟於事，認識到清政府積弊重重，無法挽救，非徹底改造，絕不足以救亡，從而堅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38 參見（美）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第二十七頁。

39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載《辛亥革命》（一）第二十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這是孫中山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對宋嘉樹也有很大影響。他幫助孫中山把《上李鴻章書》刊登在林樂知主編的《萬國公報》上。

這時的《萬國公報》，正宣傳外國傳教士對中國實行「維新」的主張，企圖使中國發生便於外國列強掠奪的「變革」。由於《萬國公報》正由宋嘉樹經營的美華書館承印，所以使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得以作為一篇鼓吹改革的文章刊登出來。同時，宋嘉樹還在他的書房和印刷所裡與孫中山等人長時間討論以後的革命活動。孫中山認為既然和平改革已無成功希望，只有組織革命團體進行武力推翻清王朝一途。宋嘉樹完全支持孫中山的計畫。

搞武裝起義，一要有革命團體，二要有巨額經費。解決這兩個問題，孫中山把希望首先寄託在有強烈愛國心和革命性而實力又雄厚的海外華僑身上。因為他們身處異國，受到階級與民族的雙重壓迫，深感政府腐敗和祖國貧弱之苦。於是孫中山決定奔赴檀香山，建立革命團體，向華僑募款，以便回國實行武裝起義計畫。

就在一八九四年這一年，孫中山第一次在宋家見到了宋慶齡。當時，她僅僅是個一歲多的嬰兒。誰也沒有想到，孫中山對宋嘉樹的影響，後來卻在宋慶齡身上開花結果。

孫中山離滬出國時，囑託留在上海的宋嘉樹，要經常把國內情況通報給他。這年十一月，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終於在檀香山成立。當時，中日戰爭的形勢是：清兵屢敗，朝鮮既失，旅（順）威（海衛）也相繼淪陷，京津岌岌可危，清廷的腐敗無能已暴露盡淨，全國人心激憤。在上海的宋嘉樹認為機不可失，即飛函孫中山，促其立即歸國，最先建議要

發起武裝起義。⁴⁰

孫中山接讀宋嘉樹的來信，大為振奮，立即中止了原計劃的美洲之行，與鄧蔭南等三十五個革命黨人急速回國，策劃武裝起義，準備襲取廣州作為革命根據地。這就是一八九五年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未及發難即遭失敗，孫中山與宋嘉樹兩人的戰友陸皓東壯烈犧牲。此後，孫中山被清政府通緝，長期流亡國外；宋嘉樹因未暴露身分，得以繼續留在國內活動。孫、宋兩人雖天各一方，卻皆殫精竭慮為中國革命而奔走。

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組織過十次武裝起義，但都沒有成功。在此期間，宋嘉樹除積極為革命籌集經費外，他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利用美華書館秘密印刷宣傳革命的小冊子，不僅印興中會、同盟會的宣傳材料，還印孫中山的著述如《倫敦被難記》等。

到一九〇四年時，宋嘉樹依靠刻苦實幹已經富裕起來，並成了上海灘上小有名氣的人物。他除了經營麵粉公司外，還依靠卡爾的說明，進口機器設備，投資興辦了香煙廠和紡織廠。宋嘉樹如此熱心於發展中國的近代工業，也出自於他「實業救國」的思想。在這一點上，也是與孫中山關於中國工業化的思想相通的。隨著企業的發展，他把越來越多的流動資金貢獻給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並為革命者提供更多地下活動的安全場所；興中會的一些核心領導人員經常在他虹口宅第及山東路印刷所開會；一般成員則把他創立的基督教青年會當作安

40 參見《建國方略》，載《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二百三十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三月版。

全的處所，他們可以在那裡聚會，而不致引起別人的注意。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為基礎，並聯合光復會等反清團體，組織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宋嘉樹被孫中山吸收為會員。此後，他利用自己在實業界的地位及其在中國和美國的社會關係，更加積極地為革命籌措經費和進行革命宣傳等活動。

宋嘉樹對革命赤膽忠心，不求名利，他所做的種種革命工作都是秘密的，貢獻很大，受到孫中山的高度評價。孫中山稱讚說：宋嘉樹參加革命「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⁴¹

但是，宋嘉樹的這些活動，對家裡人總難完全保密，而且他還要通過各種方式向妻子和孩子們進行宣傳教育，以求貫徹其革命宗旨，尤其是孫中山在宋家寄居，受到他們全家的尊敬和熱情接待，孩子們把這位「溫文爾雅的叔叔」視若「教父」一般。倪珪貞原先不知道丈夫與孫中山進行著危險的革命活動，知道後大吃一驚，驚魂稍定後，就決心支持丈夫的事業。據宋慶齡回憶說，後來母親「也承擔了愛國的任務，進行秘密工作」。父親在家中秘密為興中會和同盟會印小冊子、講話等，「父母告訴他們不要聲張，禁止拿印好的革命小冊子」。⁴²後

41 《致李曉生函》，載《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三百四十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42 參見張珏：《在宋慶齡像前的回憶》，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艾蜜莉·哈恩：《宋氏家族》第七十五、七十六頁。

來在報上看到孫中山被通緝的消息，他們全家也就更加認識到宋嘉樹與孫中山從事的工作的偉大意義及其危險性，並做好了隨時應付事變，包括流亡國外的準備。

在宋嘉樹的家人中，最認真看待宋嘉樹與孫中山的交往與革命活動的是宋慶齡，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她還經常思考父親與孫中山談論的問題。

一九〇〇年，宋慶齡才七歲，就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這年春夏間，一方面由於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蓬勃發展，帝國主義八國聯軍入侵，清政府的統治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改良派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會（容闈為會長），組織自立軍，準備「討賊勤王」。孫中山決定把握時機，擬聯絡容闈等人集結反清力量，計畫先由江蘇、廣東、廣西等南方六省宣佈獨立，全國各省回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於是，他於八月二十八日，從日本橫濱秘密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停留時間雖然不長，但曾與宋嘉樹談論進行反清革命的問題。宋慶齡見到孫中山這一位不凡的來訪者，並被他和父親的談話所吸引。孫中山的救國理想和「痛感人間不平而終生投入革命」⁴³的獻身精神，在她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她發生了啟蒙作用。有一次，她聽見孫中山說，中國非革命不可，我們要推翻現在的這個君主政體，建立一個共和的政府。我國人民有權利自己選擇管轄他們的人，選擇替他們制定法律的人。我們應該有一切的權利；我要為這個目的而生，要為這個目的而死。慶齡聽到這裡，輕輕地應聲說：「我

43 《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載《宋慶齡選集》第二十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也要同你一樣。」孫中山立刻對她說：「不錯，慶齡，你當然可以幫助我，每個人都得幫助我。」⁴⁴

「我也要同你一樣。」小慶齡的這一句簡單插話，使宋嘉樹和孫中山深感驚奇。宋嘉樹早就覺得宋慶齡與宋藹齡、宋美齡及一般女孩子不一樣：不大注意吃穿打扮，而對周圍的事情過於機智敏感。正是這種特有的機智敏感，隨著她年齡的增長，父輩們的言談活動也就日益對她的思想情感產生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孫中山，由於他始終是宋家談論中的英雄，就使他的為人和革命精神在宋慶齡心靈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這種印象進一步發展成為宋慶齡對孫中山的愛戴和崇敬，把他視為了不起的革命英雄，並常對人說要像孫中山那樣生活。她曾經說過：「我想起孫先生所講的話來，就忘了一切——家庭、學校等等。我一點也不為自己擔心，我卻擔心著中國。」⁴⁵這說明孫中山對宋慶齡成長中的思想影響是相當深刻的。

小小年紀，壯志凌雲。宋慶齡成人後與孫中山結合，走上革命道路，而且不避艱險，勇往直前，並不是偶然的。

44 [美] 斯賓塞：《三姐妹——中國宋氏家族的故事》第四、五頁，一九三九年英文版。

45 [美] 斯賓塞：《三姐妹——中國宋氏家族的故事》第二十二頁，紐約一九三九年英文版。